

《人民的名義》中的派系理路 碰撞與墮落：文人參政的另一種面向

當文人從書齋中走向政壇時，原本作為知識人的超然與獨立意義也就沒有了。這些人肩負期待走入宦海，但是不少人卻比官僚更加腐化，派系的橫行、排除異己，都不會自外於文人從政的歷史書寫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這就是《人民的名義》中的故事：一個從政的大學教授，最終形成了強大的政法體系的派系。文人亦是人，不能夠過高估計文人的道德品行和自律能力，這或許是《人民的名義》帶來的一種思考。

朋黨之師，不為傳道為奪利

在《人民的名義》中，最突出的政治團夥和派系便是漢東大學政法系畢業生組成的漢大幫。幫主乃是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系教授、後來任職省政法書記的高育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政法書記事關檢察院、法院、公安機關的上級領導者。高育良深諳此道，將自己的得意門生祁同偉提拔成為公安廳長，以此為開端，打出了漢大幫的旗號。

「老師」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無比崇敬。「老師」又稱「先生」，乃為傳道、授業、解惑。「老師」一詞地位高，可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句話中得到鮮明印證。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傳統中，一個人要尊敬崇拜的對象，乃是「天地君親師」。沒有老師的教誨，一個人便是未得到教化的鄉野蠻夫；有了老師的教誨，便可以視為讀書人，進可博取名，退可受尊鄉間。孔子被稱為萬世師表，不計個人得失進行講學，乃是重要因素。到了科舉時代，主考官成為中舉考生的老師；被皇帝選中的則是天子門生。

知識分子與政權的緊密結合，造就了古代的朋黨派系政治。師生組合成為了一種奇妙的聯盟。忠於自己的老師，在道德情操上似乎無懈可擊、合乎禮教；在個人利益上則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官場之中，下級拜會上司，應稱呼官職。但作為下級的學生見到作為上司的老師時，一聲「老師」則道盡其中無限的奧妙：學生心想，我是您的人，請多多提拔；老師則認為，你是我的人，不要和別人搞在一起；萬一出了什麼問題、犯了什麼事，則一聲



《人民的名義》宣傳海報。資料圖片

「老師」能夠換來從輕發落。且不能忽略的一點是，在中國文化中，「背叛師門」是非常嚴重的道德指控，所以師生一體便成為了不少人的選擇。國民黨統治時期，黃埔學生稱蔣介石為「校長」，構成了親衛隊式的黃埔嫡系。不同派系的傾軋，導致了國民政府的垮台。

與單純書齋中的師生關係不同，師生關係一旦到了具體的現實鬥爭中，便成為了朋黨式的派系。《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拚了命推薦學生祁同偉擔任副省長，便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尋求一個延續模式。顯然，這已經是一種為了自己和自己派系私利的朋黨師生類別。這樣的師生關係，已經不再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是以師生之名行巧取豪奪、私相授受之實。

文人當官，有時墮落得更快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這兩句成語，常用來形容知識分子對天下大事的一種觀感。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承擔的乃是道統，道統便是確保君王和官方的施政合乎禮儀教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實施，知識分子實踐道統的方式，變成了做官。中國古代官場上，自從實施了科舉以來，高官權臣多以科舉出身，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改變官場的腐敗和文人的墮落。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句話某種程度上是對「文人當官、進而墮落」的一種諷刺。在《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經是一個法學教授，在課堂上對法律、正義等概念能夠高談闊論。從政為官之後，高育良也一度是一個清廉、謹小慎微的人。不過，最終，他倒在了以「探討明史」為名義的石榴裙下。不僅如此，他也利用自己帶出的學生，組織了自己權力聯盟性質的派系。知識分子出身的高育良始終覺得自己沒有犯罪，似乎沒有任何把柄可以被別人抓住。這種「流氓有文化」的寫照，戳破了「文人當官、拯救天下」的謊言。

中國古代歷史上，知識分子當官之後會墮落乃是常態。專業化的官僚集團與文人之間總是存在某種張力。文人們覺得自己有治理天下的才華，又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水準。如此一來，道德成為了文人集團的符號。明代的東林黨人是知識分子參政的典範。但無論對歷史持何種觀點，東林黨人在明代稅制改革的問題上，反對向工商階層收稅，變相導致了農民負擔的加重、明朝國庫的空虛，國家最後滅亡也在情理之中。而民國時期，從熊希齡的「超一流人才內閣」到後來胡適、蔡元培提出的「好人政府」，其最終的失敗都顯現出知識階層從政的巨大障礙。

知識分子往往自詡是有文化、有道德之人，所以對官場中的諸多現象看不順眼而加以批判，這並不奇怪。但這代表知識分子能夠掩飾住自己對權力的渴望嗎？不。從中國古代歷史的角度看，有些文人的批判，與其說是對醜惡的不滿，倒不如說是對自身無法躋身權力體系的不滿。一旦自己到了權力體系中，成為

分享權力的一分子，則抗拒誘惑、抵禦腐蝕的能力，恐怕比官僚階層來得還要差，即「進入花花世界，方知眼花繚亂、人生苦短」，因此要及時享樂。所以，也就徹底腐化了。

不能忽略的精英情結

《人民的名義》呈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構中，高育良是一個關鍵角色。中國文化符號中的精英編碼，在這部電視劇中有了第一次全景式的展現。高育良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說辭來將自己的歪理與行為合理化、合法化；他也能夠用各種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將來自他人和對手的攻訐化解在無形之中。而在他的內心深處，亦有非常「人文」的一面：他鍾情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的《好了歌》，似乎總有看破紅塵之感。但事實上，搖身一變，他又會為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

這或許就是一種延續自古代的精英情結在作祟。文化精英可以用一切華麗的辭藻為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和美化。這不僅是一種話語上的霸權，同時也是社會階層上的霸權。在傳統歐洲左翼的立場中，知識階層應當有擔當、應當扎根在民間、應當立足民眾，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大眾的一部分；但傳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則是一種身份等級的體現。歷朝歷代與職業官僚相抗衡的清流集團，不僅在國政中以道德表率的形象示人，也透過不斷的政治對抗確立自身不可動搖的存在和價值。

透過《人民的名義》可以感知到一種文人從政的悖論：為理想而介入政治，在政治中喪失理想。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顧準曾經說過，人間無法建立天國，人間只可能實現實實在在的進步。當你堅信人性本惡這一原則時，則透過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才能夠將權力關進籠子；面對人民，無人可以傲慢，惟有謙卑。

「海歸」 創客推廣少數民族 傳統文化



貴州省民族文化豐富多樣。新華社

「我在日本看過多彩貴州的宣傳廣告，貴州的生態、風景、文化開始走向世界，吸引了愈來愈多的目光。」「海歸」創客施思自豪地說。2002年，她前往新西蘭奧克蘭就讀高中，後考入奧克蘭理工大學就讀市場行銷與管理專業。7年後，她學成歸國，和丈夫一起在貴陽發展。「貴州發展速度快，機會多，創業優惠政策也多，適合有激情、有想法的創業者。」她說。

貴州省有17個世居少數民族，民族文化豐富多樣。作為土生土長的貴州人，施思希望把貴州特色民族文化「正確」地推出去，讓更多人了解貴州文化。她介紹道：「比如苗族，其實有很多支系，花苗、黑苗、小花苗、海地苗等，他們的文化都屬苗族文化，但有區別，每個支系內部的變遷形成了文化之間的差異，服飾、頭飾等都不盡相同，並非所有的苗族都戴銀飾，但大眾已經形成了一種固有印象。」

去年7月，施思和從瑞士留學歸來的李昱麗成為合夥人，希望依靠「海歸」的背景和資源樹立貴州文化的品牌，成為貴州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對外傳播窗口，更好地推動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我們的文化很有吸引力。」施思舉例說，去年10月她帶著兩個苗族和兩個布依族學生作為貴州代表隊，到澳門參加中國民族商品文化工藝展，「一開始我們覺得沒有底氣，沒想到在現場被多次邀請返場表演。」

本身對貴州文化的自愛感以及這次經歷感受到的認同感，讓施思和李昱麗有了更多的信心。施思說：「貴州有很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現在社會發展愈來愈趨同化，如果沒有人去傳承、保護，可能隨着時間的流逝，文化就只能成為歷史。」

「愈是想要發展，愈是要保護、要傳承。」施思認為，貴州的苗族、侗族文化，因為受到很好保護，很多民族村寨都「活」了，當地民眾也因此致富，貴州還有很多值得重視、保護、發展的民族文化，而她們要做的是換一種方式把文化的原貌展現出來，但不去改變它，讓文化找到社會價值，之後自然就會有經濟價值。「不能為了商業去曲解文化，造成文化誤解，要做到正確、有深度，讓人們了解以後有想要更深入的願望，只有這樣，才會更多人願意來貴州投資文化產業。」

如今，施思團隊已和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多個國家建立起了合作關係。「我們不僅僅要做到對外傳播，還要成為一個雙向交流的平台。」今年7月，團隊將組織參加奧地利舉辦的一個國際藝術節，希望藉此機會讓外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貴州文化。「未來我們將與世界更多國家建立聯繫，讓貴州特色文化出現在更多的世界舞台上。」施思說。

文：新華社



《人民的名義》呈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構中，高育良是一個關鍵角色。網上圖片



陸毅飾演反貪局局長侯亮平。

讓更多人感知文化魅力 ——三位守護傳統文化的文藝家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口號，需要行動。這三位文藝家，用不停歇的腳步、不偷懶的「笨方法」，不斷的思考、探索、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讓更多人感知文化魅力。

民間文藝家潘魯生： 走出來的文化自信

如果問哪一類文藝家是常年行走在大地、奔波在田間、最貼近老百姓——那一定是民間文藝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協主席潘魯生是踐行這一優秀傳統的代表。

早前政協會議開幕的前一天，潘魯生剛剛從廣東調研探風回來。基層調研，是政協委員履職的重要方式，也是民間文藝家潘魯生的日常生活。

作為一位對保護和傳承民間文藝有著強烈責任感的畫家、學者，他30多年不斷地行走在民間文化的鄉土上，開展田野調查、學術研究和保護實踐。特別是近3年，他帶領開展「城鎮化進程中民族傳統工藝美術現狀與發展」課題研究，走訪了近20個省份，調研了130多個手工藝專業村，採訪民間藝人800餘人，匯總整理了大量民間文化的數據資料，並就民間文化傳承發展提出建議。

潘魯生說：「下鄉採風時能遇到很多民間藝人，他們通過剪紙、繪畫等形式來表現四

大名著裡的形象，栩栩如生，直擊人心。」
「文化在基層落地生根，留住了民族的根脈。」潘魯生在調研中還發現，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改善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還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在山東臨沂，他看到當地傳承發展柳編工藝，「家家種柳，戶戶編織」，10萬名農民創造了價值17.99億元的「臨沂柳編」品牌。

單霽翔： 用「笨方法」守護世界文化遺產

「故宮是世界上觀眾來訪數量最多的博物館。自『限流』措施實施以來，2016年觀眾超過1,600萬人次，其中海外觀眾300餘萬人，創歷史新高。」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用略帶沙啞的聲音說。

如何守護好管理好這份文化遺產，單霽翔用的是「笨方法」。
從神武門向西沿故宮巡查一圈，這是單霽翔自2012年初上任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每日功課」。為了踏遍故宮9,000多間房子的每個角落，他甚至準備了20多雙便於行走的布鞋。

正是這種「笨辦法」，讓單霽翔對故宮的「家底」心中有數，對安全隱患了然於胸。作為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故宮被公認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展示平台和窗口，是必須被「重點

保護」的對象。
在單霽翔眼裡，文化遺產不應只是少數專業工作者呵護的對象，不應「鎖在深閨人未識」，而應當融入文化和社會，在保護中利用，在利用中進一步詮釋和豐富它的歷史、科學、藝術和社會價值。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注重面向公眾開展教育活動，特別是針對青少年的各類活動。據統計，每年在故宮裡開展有組織的公眾教育活動多達25,000場，直接參與觀眾20萬人次；已舉辦101期「故宮講壇」，內容涉及古代建築、文物研究與鑒賞、明清歷史、文物科技保護等諸多領域，擁有大批「骨灰級鐵粉」。

自稱為「故宮守門人」的單霽翔，十分清楚網際網路對傳統文化的傳播力量。他今年提交的16份提案中，有一份就是關於促進博物館實施「網際網路+中華文明」的提案。
「博物館應準確把握青年人的興趣和關注點，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以富有內涵且饒有趣味的形式推廣傳播，就可以把『陽春白雪』的內容變得『喜聞樂見』。」單霽翔說。

川劇名家沈鐵梅： 革新助推中國川劇走向世界

川劇重演不重唱、好看不好聽？一提川劇



沈鐵梅致力於革新川劇。資料圖片

就是「變臉」？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多年來一直潛心思考：在快餐文化與好萊塢大片的影響之下，如何讓優秀的傳統戲曲藝術在今天煥發生機？一次次實踐與探索，讓沈鐵梅理清了思路——拯救川劇需要革新。

「首先要解決川劇聲音的美感問題，讓川劇不僅演得美，更要唱得美。」經過多年潛心鑽研，沈鐵梅發現，藝術表演可以引導觀眾，讓觀眾發現、領悟藝術之美。
從2004年到現在，沈鐵梅帶領着表演團隊頻頻出訪，踏上美國、法國、瑞士、匈牙利等國家的土地，一次次將川劇藝術送上西方國家星光璀璨的藝術舞台。
為了推動中國川劇走向國際，沈鐵梅幾乎每年都在人代會上建議拓展傳統藝術國際視



單霽翔也將故宮的講座帶來了香港。張岳悅攝
潘魯生認為民間文藝來自人民和生活，它維繫文化認同。新華社

野。2015年，她提出要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促進「一帶一路」文化交流；2016年，她提出提高翻譯準確度助推中國戲曲走出國門；今年，她又為向世界展現中國戲曲藝術提出建議……10多年來，沈鐵梅每走出去一次，就自信一次。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沈鐵梅看來，對待傳統藝術，不肢解歪曲，不盲目逢迎——這就是文化自信。在一座座歐洲藝術之都，她專門為西方觀眾講解中國戲曲程式，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戲曲藝術的美學規律。「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程式和意境之美，充滿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沈鐵梅說。
身材嬌小的沈鐵梅信心滿滿，她要將中國傳統藝術引向更加廣闊的舞台。
文：新華社